

文史选刊

第15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温历史，为了今天和明天

王大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球性战争，是人类的一次大灾难。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欧洲战场，即使从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算起，也超过了八年。八年中，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牺牲，歼灭并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拖垮在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温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带给我们许多宝贵启示。

首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求得生存，从根本上讲，必须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经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会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被动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虽然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基础还不够强大。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一心一意把国家建设好。

其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侵略我国，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了旧中国国民是一盘散沙。外敌入侵，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最终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应当提倡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

战争动乱的受害者最终是人民。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丝毫不亚于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罪恶，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从根本上讲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日本 一些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人企图篡改历史，抹杀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但是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也是同日本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中日战争已成为过去，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为了昨天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了中国、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宁，我们有责任把历史告诉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

（注：这是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为《抗战纪事》一书所作的序，本刊略有删节）

ZC46/38

文史选刊

第 15 期
1995 年 8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
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本期编辑：
张伯林
张晨声
赵　玉
王文宝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亲历　亲见　亲闻

1	重温历史，为了今天和明天	王大明
4	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	张庆余
7	沦陷时期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	徐白
11	忆谭志诚烈士	赵清
13	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学运	耿宝珍
17	日军屠杀平家疃村民的暴行	刘祥久
20	我被抓到日本做劳工	鲁德森
24	抗击日寇的东田阳战斗	王万全 房志义
25	火烧小辛庄目击记	李崇才 李维迁
26	我的童年回忆	朱向如
28	日寇强征民工 修建三间房飞机场概略	田广智

编辑出版：《文史选刊》编辑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县新华大街 113 号
邮政编码：101149
电　　话：9548400　9543308

具体　翔实　生动

29 我所了解的日本一四一八部队	陈乃文
30 日本侵略军抢劫样田村见闻	狄　英
31 血泪永记应寺村	李树成
32 佟麟阁与佟麟阁街	韩万珍
33 赵登禹大街的历史渊源	韩万珍
34 日寇罪证——安田碑	周　良
35 中国抗日战争基本情况	何仲山
36 日伪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计划	通县档案馆
39 通县人民抗日大事记	张向群
封面 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	晨声摄
封二 通县以抗日将军名字命名的街道	晨声摄
封三 沦陷时期的通县图片资料	通州博物馆提供

激光照排：北京市万华龙电子技术公司

四封印刷：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内文印刷：京通印刷厂

工 本 费：2.00 元

China

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

张庆余

一

1933年5月，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之后，划冀东为不驻军区。接着，蒋政权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警卫地方。因此于学忠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队长（我和张砚田原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我驻防杨村，张驻防山海关），其营长和连长亦由第五十一军抽调，排长和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特警总队每队五千余人，系由河北省各县新征来的士兵组成。我和张砚田各率所部新兵，分驻武清县和沧县，开始训练工作。

1935年5月，我们奉于学忠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总队部先驻蓟县，旋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之留守营。

当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我们这两个总队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规军队，所以没有随同开走。于学忠离河北前，曾密召我们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同年7月，商震继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后，改河北特警队为河北保安队，仍令各总队长安心供职，驻守原防。

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后，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伪政权统辖。不过名称虽然更换，内部人事却无任何改变。

这时，我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应如何应付，商震嘱孟润生密告我："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

我的大儿子张玉珩听说我在伪冀东政权任职，认为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因以密告我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同年，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我和张砚田密请张树声介绍往见宋哲元，表明愿随宋抗日。张树声慨允所请，旋即向宋禀报。宋甚愿与我们相见，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耳目起见，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十七号路宋宅与我们会晤。张树声与宋约定时间后，即通知我们在家等候，宋当派人前往邀请。届时，宋派副官陈继先到我家相邀，我们遂一同前往宋宅见宋。宋对我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近又听俊杰（张树声字）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声明，请二位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宋还嘱咐我们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以防日军侵略。说罢，即命萧振瀛送给我们每人各一万元。我们向宋致谢，说："我俩今后愿一心一德追随委员长为国效力！"宋连称："好，好。"我们遂与宋握手告别。后来保安队在通县起义，与我们这次和宋哲元晤谈是有关系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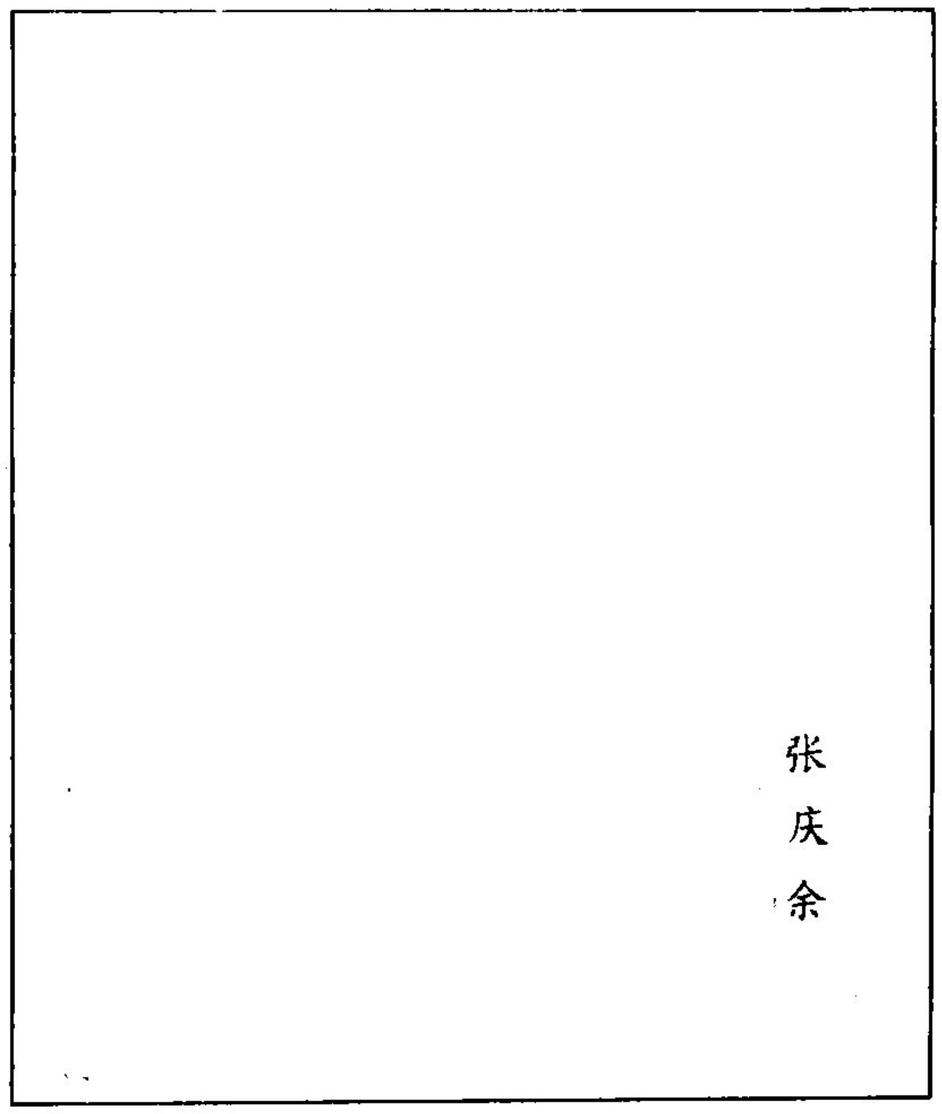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我派心腹刘春台（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对刘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嘱刘密告我："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刘春台辞别冯治安即往见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当即将我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这时，日军驻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为预防第二十九军进攻通县，特召集我和张砚田在通县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并出示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要我们根据地图作出防守计划。我起立发言："我俩都是行伍出身，没有学问，不懂得军用地图。但我俩确具信心，保证能守住通县，并可配合皇军打垮二十九军。不过目前兵分力薄，战守均无把握，我的意见，莫如先抽调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县待命，然后再徐议攻守，如何？"细木深以为然，当即照准，并认为我们忠实可靠，遂令散住各处的日侨亦集中通县，以便保护。

我随即与张砚田分别下令，调动所辖散驻各处的部队集中通县待命，并对调回的部队分别讲话，暗事部署。这时，冀东伪保安处处长刘宗纪见我神色异常，料知有变，因窃与我耳语说："你预备反正，如何瞒得过我。但我也是中国人，岂肯甘作异族鹰犬。望你小心布置，大胆发动，我当追随左右，尽力协助，以襄义举。"

我见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视，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7月28日夜十二时在通县起义。到时，我派兵封闭了通县城门，断绝了市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



张庆余

围了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文庙内），把汉奸殷汝耕禁闭起来。我同时又派兵前往西仓，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细木闻枪声四起，料知有变，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细木一手持枪，一手指斥我军官兵，大声叫嚷说："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奸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细木的话还没有说完，即被我军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急反身窜回特务机关内，闭门死守。旋被我军攻入，占领了特务机关。

我部营长沙子云奉我命督队进攻西仓日兵营。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三百余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大约有六七百人。闻我保安队起义，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遂集合宪警和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外援。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我忠勇官兵牺牲于日军炮火之下约二百多人，迄未得手。我见此形势，若再不能突破，日军开来大部援兵，内外夹击，更对我军不利，于是决定改用火攻，下令全军："有能从汽油库（亦在西仓，距日兵营很近）搬汽油一桶到日兵营四周的，即赏现洋二十元！"士兵激于爱国义愤，闻命踊跃争先，顷刻间，汽油桶已堆满日兵营四周。我见汽油

已运到，下令前线士兵，纵火焚烧。刹那间黑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沸腾起来。我军复用大炮和机枪猛烈轰击，集中扫射。接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从四面冲入，远的枪击，近的刀砍。激战至29日上午九时许，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日军驻顺义一队约二百人，亦被我驻顺义的苏连章团奉我命于同日乘日军不备，突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苏连章团完成任务后，于29日上午十时整队开回通县。苏团开抵通县为正午十二时，适日军派来轰炸机二十四架，对我通县起义军滥施轰炸，苏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众。日机从正午十二时起至黄昏时止，轮番轰炸，达七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在难以支持，于是脱去军服，弃械逃走。

张砚田因见日军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我忙于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继结伴逃跑。

三

张砚田、苏连章等相继逃亡，这对通县起义军影响极坏。我获悉后，深感局势危急，象这样混战下去，我军愈战愈少，日军越来越多，势难坚持，遂决定趁当夜日军尚未合围，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第二十九军合兵一处，再作后图。于是我将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由我亲自督队，平行转进。及开抵北平城下，始悉第二十九军已行撤出，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这时，日军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将殷汝耕劫走。敌复从城内开出装甲车二十多辆，集中火力向我起义军猛烈轰击。我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和区队长张含明因在火线上督队奋战，致中敌弹相继阵亡。我英勇的官兵，因冲锋肉搏，伤亡亦众。

我见第二十九军已去，本队形成孤立，加以前被阻截，后有追兵，若聚兵一处，待至天明，敌机必来轰炸，这么一来伤亡必多，实无异束手待毙。于是决计趁天色尚暗，化整为零，分全军为一百二十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孰意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分别截击缴械。及我到保定后，我部官兵闻讯，都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请求我向孙殿英交涉，索还武器，仍愿开赴前线为国杀敌。我当即用好言安慰，嘱令静待后命。嗣后，我见宋哲元，宋握我手太息地说："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卒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这时，孙殿英适来保定，闻我在此，自知理亏，遂拨转马头避回防地。

不久，我被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报告起义经过。蒋安慰我说："你这次在通县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余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入战斗。"接着又问："你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我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衔有中央密旨，我们似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委员长，转解中央法办较为妥当。因此未及时执行枪决。孰意解至北平城下，竟被日军劫走，殊属憾事。"蒋听罢，未置可否，要我先回旅馆休息，明日可往见何部长，再详商补充办法。次日我往见何应钦，何既置补充事不提，又不许我回本队，任我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1938年，复改派我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我因病恳辞，终未到职。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七七事变》）

张庆余　原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



沦陷时期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

徐　白

通县地处京、津要塞，日寇视作重点窃踞地区。1935年(民国廿四年)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日寇的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顾问、警察署以及日韩“浪人”等，相继来通，采取利诱、威胁之类方法、手段，逐渐参与地方一切政治活动。迨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据通县，竟视华北为其“属地”，视中国人为其“属民”，直接统治，为所欲为，极尽压迫、掠夺之能事，对通县地区更具有“报复”之意。

通县人民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受害亦最烈。真是九死一生。能生存到今天者，实非梦想所及。如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痛。

关于日寇军事方面的残酷屠杀

(1) 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通县有日寇的侵略军驻扎，乃于7月27日，首先驱逐我第二十九军驻通县南门外的部队。7月29日，张庆余率保安队起义杀敌，亦撤出通县西去。随后日寇以查缉保安队人员为借口，肆意残害无辜群众。仅一、两个月内，通县城乡，凡认为可疑者就捕入西仓刑讯处死，无一幸免。

据当时的伪通县县长王季章透露：被处死的人数近千人之多（后来发现的尸骨可证）。日寇投降后，在伪县政府后边（现花丝厂内）发现的尸骨亦很多，时人称为“万人坑”。

1938年8月14日，日寇以剿匪清乡为名，捕杀于家务村民三十余人，烧民房一百五十余间，粮食数百石。1939年4月，日本宪兵和翻译数人到旧南门外东营村，以搜捕前保安队某小队长为名，调戏其妻。暗藏的某小队长击毙日本宪兵一名而后自刎。不久，日本宪兵队包围东营村，劫掠财物，并焚烧民房数十间。

通州沦陷期间，日寇不论白天黑夜随意搜捕百姓，奸淫劫掠，无所不为。百姓被打死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外逃者更多。通县在沦陷八年之中，不知有多少同胞丧于日寇屠刀之下！其惨状难以言喻。

(2) 日寇占领华北后，自1940年至1945年间，计在通县实施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由河北省伪政府命令各县，各县再通过县的会议后，即通知村、镇进行准备。其实施是由县政府的民、财、建、教各科并协同新民会的负责人在军、警、宪的保卫下到预定的村镇，集合全村人训话以及查询逮捕认为可疑的反日分子，甚至当面毒打杀害。而日伪的主要目的，是在强化保甲制度的“连坐法”，进行严厉镇压和加紧抢征粮食以及所急需的物资。也是日伪人员乘机索贿发财的好时候。村民损失甚巨。

(3) 日寇强占民田、强征民工，修建通县南三间房机场。1942年日寇在通县南三间房征用民田二十余顷，每亩年给玉米五斗，同时在冀东各县强征民工二千余人，自带粮食、工具，昼夜赶修飞机场，为时数月，民工备尝虐待，并使机场附近村民流离失所。幸好竣工不久，日寇失败之势已成！日寇乃连夜烧毁飞机数架和很多军用物资。日寇之残忍暴殄，可见一斑。

(4) 日寇责令村民维护交通线路。日寇为了确保铁路、公路和电线的交通安全畅通，防止破坏与窃听消息，乃严令沿交通线

路各村居民分段负责守护，并随时报告情况。如有怠忽、放纵即严予惩办。

在冬季则令沿运河两岸附近各村居民，要破碎河冰，不让运河封冻，以防止冰上通行。至于日寇任意砍伐民间树木修筑工事以及收捐勒索则时时有之。人民莫之奈何。1941年日军大冢部队驻西仓时即有此举。

(5) 日军警哨对人民的暴行。城乡人民往来县城，经过城门或日军营地时，无论距离远近，均须向日军哨兵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再行通过，或有所查询，稍有不周，即被毒打或罚跪，对于妇女有逼令脱掉衣服检查者，侮辱调戏，无所不为，甚至逮捕百姓动用特刑，如灌凉水加小米，或灌屎尿，或装麻袋内让狗咬，使受刑人一再昏却，直至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而死于非命。总之，日寇对沦陷区人民施加的暴刑，实有意想不及者。

关于日寇政治方面的残酷统治

(1) 日本顾问和宪兵队的严厉统治。日寇占领华北以后，将华北视作其殖民地，施行直接统治，专断地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伪职傀儡人员已无发言权利，无庸进行商议，视中国人为亡国奴，任其驱策，不得违抗或有所怠慢。

(2) 伪新民会的建立和对物资的掠夺。1938年春，伪冀东政府与伪冀察政委会合流后，在通县建立伪新民会(会址在射圃胡同)，是常设机构，内有日本顾问(名角田)。这一伪组织根据其名称叫作“会”，应属群众性组织，按系统其最高的称“中央新民总会”，以下是“省总会”、“道总会”、“县会”、“乡分会”。内部组织：县级是以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当然会长，以下设次长，是日本人当。会长只是虚名，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开大会时通知他出席参加，也只是听会，不表示任何意见。次长掌握一切，再下分部员、雇员两类，部员能当各股主任，雇员只作辅助工作，不能当主任。内部事务分四股一所，计宣传、会计、庶务、医药，各设一主任。另有青年训练所，设队长一人，训练由各乡招来的青年队兵。

日本投降前三、四年(约1941年)，内部组织改变。从中央级到县级改称“指挥部”，县级设部长一人(由中国人担任)，有一日本顾问，和县长的顾问是一个人，部长以下分三科：

第一科——设科长一人，管行政，主要是散发小册子，宣传“麻醉”口号。

第二科——设科长一人，管武装队，就是青年队的变形，平时借用残、假枪支训练，并各处搜查、逮捕，借机向乡间敲诈勒索。

第三科——设科长一人，管会里的会计、庶务以及一切不属于第一科的事务。

科以下各因事务的繁简设不同数目的股，各股设股长一人，股员、文书二、三人不等。

外表形式：机关前有招牌书××县(乡)新民会；会旗用大幅黄布中嵌红、绿阴阳八卦鱼，悬挂门口；会徽铜制黄边圆形，内镶阴阳鱼，会里人佩戴标志。

会伪主任为廖广生，科长有焦庆轩，职员有刘廷元、黄济中，并有少数武装，队长为肖永瑞(肖厚斋之子)，以上几人都是通县人。此外尚有一个合作社，主任为戴仙洲，系通县上店人。

新民会是一个地方群众组织，名义上不干预县政，实则什么事都管。其中最主要的是训练青年(定期召集训练，人称之为“棍儿团”)，是日寇为将来预备的，以之代替日军维持地方的，是日寇爪牙，用以镇压中国人民的。

其次为合作社，是日寇的供销社，推销日货和搜刮物资。主要任务是征收县粮，积于西海子，及时运往日本，以应军需。与此同时，制造敌占区的饥荒，来削弱我人民抗日力量和意志，顺从其统治、奴役。

(3)日寇改变地方现行组织制度，以便控制指挥。日寇占领通县后，即改变通县行政制度，由全县五个区改设五十八乡镇，乡设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副乡长各一人，地方自卫团长一人，乡丁若干人。首先分散事权和区团的武力，以便控制，避免“尾大不掉”或有所团结抗拒。嗣后又把五十八乡镇改为十三乡。这时日寇以为具有相当的把握，为便于集中指挥运用，对警察则改局为所，合县府办公。由日本人（前为峰岸，后为角田）掌握，下有保安系、警务系、警法系、特务系等四个系，系有系长，司理公安、侦缉、审讯、谍报等事务。此外另有经济警察班和情报室则归日本顾问直辖，主要是防止反抗和掠夺物资等活动。

关于日伪经济方面的掠夺和控制

（1）由伪新民会所领导的合作社按全县田赋征收粮食和抢购粮、棉等各种重要物资，先集中到西海子，再转运日本，以应军需。同时经销各种日货，与商民争利。

（2）冻结通县粮栈业的二十三家约现粮二万三千余石和六镇的现存粮食，调查登记，不得动用，以之供应县警备队的饷糈，加之奸商屯粮走私和小贩偷运外地，乃造成粮荒，致通县一带粮价一日数涨，而劳动人民终日不得一饱。后来吃混合面亦须排队待购（混合面系十数种物质，如谷糠、稻糠、玉米骨等加上少量玉米面、红薯干以及观音土茶混合而成。其色灰红，味苦辣，不易消化，大便困难，因致疾造成不少人死亡）。于是北平大商号派专人来通县以高价购买茄子、倭瓜当作主食者不少。粮食困难可见一斑。

（3）日寇不但掠夺粮食，对于煤、盐、铜（1941 年后曾发动献铜）、汽油、煤油以及药材等，都及时掠运日本。另一方面则推销日货，吸我人民的膏血，施行其“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

（4）1939 年冉抗任通县县长时期，曾明令提倡农民种植罂粟，每亩征税八元（城关有种者，农村则很少），同时并种植棉花（棉为制火药的原料），建有棉产改进社，配给肥田粉和棉种，且设立轧花厂等。

（5）日伪大量发行伪冀东银行钞票、伪储备银行钞票及少数日本金元、钞票等伪币，加以苛捐杂税（交易场特有粮捐），将人民生活的有限物资榨取殆尽。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社会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生活无法维持，日伪已物尽力竭，其失败已势所必然。

关于日伪文化教育方面的奴化方略

（1）自 1934 年起，冀东地区即陷入战乱状态。人心惶惶，难安于业。有的学校被占用（如女子师范），有的学校外迁（如男子师范师生不受笼络，迁校于北平），或经费无着，或另编奴化教材，或滥招学生（如男师伪校长凌子平滥招文化程度不齐的学生，冀东时小学改公民课为“修身”课，并添讲孝经等），或师生散失，以致教育陷于停滞状态。迨及日寇进占华北，则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对中小学派进日本教官（如女师附小日本教官名根岸），干预校务，强令师生以学习日语为主课，并对师生严行监视，师生私语即违犯禁例。如有违犯则侮辱随之，致师生教学不宁，时怀疑惧，不知演进到何种境地而何以自了。师生在这种危难情况下数年之久，忍辱含辛，而教育事业的损失更难以估计了。

（2）日寇厉行查禁和焚毁有关抗战、革命建国的政治图书、报刊以及旗帜。同时以建立东亚新秩序，提倡中日亲善，相互提携，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伪善口号，用怀柔、麻痹人的方略，结合残酷的压服手段，尽利诱威胁的能事。用奴化教育的方法，妄图达到其侵华和反共的最终目标。

（3）日寇对我们民族素有藐视心理。认为中国人愚昧无知，多数迷信神佛，故在占领地区，一方面提倡恢复旧礼教、旧道德，一方面组织各种会道门，如“先天道会”、“宏道社”、“天理教”、“念佛会”、“如意坛”、“一贯道”等宣传迷信，进行神道设教，妄谓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是由“天术”“命定”，非人力

封面照片说明

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

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位于通州卫星城北的运河旅游开发区，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461平方米，东西60米，南北48米，高17米，二层框架结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了馆名。

该馆由海军工程设计局设计，海军直属工程建筑总队施工，于1992年3月正式动工兴建，1995年8月竣工。

目前，展品征集工作正在进行，计划1996年10月对外展出。届时将是国内规模可观、展品特别是旧杂式兵器展品最多的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

（晨声摄　通武文）

可以左右，人要顺应现实以求生，不可逆天以速死。用这类谬论来混淆是非，欺骗人民。执事者借机骗财，而日寇则借此瓦解我国人民的革命思想和抗战意志，以达到其侵略的目的。

关于日伪毒化骗财方面的策略

（1）日寇自1935年伪冀东政府时起，日、韩人在通县（其他县概同）南街马家胡同开设“土药店”，由热河、京、津等地大量贩运烟土（当时有所谓满蒙公司，专门贩卖烟土），设立“土膏店”。如东街有利通膏店，西街有六兴膏店，南街有亚东膏店，北街有仁记膏店、公记膏店，鱼市口有新乐膏店，昼夜开灯设榻，有少女招待。禁烟局和警察局只征收捐税，准许登记，公开买卖吸食，无所避忌。一些瘾士、烟鬼和浪荡子弟趋之若鹜，昼夜迷恋其间，乐而忘返。甚至有些青年学生也沾染成瘾。此外尚有吗啡馆、白面房二、三十家，为害尤烈！是时吸毒相习成风，不以为耻。因此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者有之，堕落为匪为汉奸者有之。明知是日本人的陷阱，乃嗜而蹈之，可谓自作孽不可活，在敌伪时期由日、韩人为之，是企图亡我也！而此后则地方的土豪恶霸和地痞等继起而为之，其罪恶深重有甚于日寇也。

（2）设娼妓、酒馆和赌博骗财。日、韩浪人与地痞流氓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立明暗妓馆和茶楼酒肆，如山阳馆、近水楼，为日伪亵荡浪漫之所，亦即密谋生非之会议地。其赌博骗财的方法，有用汽枪打瓶子以及卖戏剧票附彩票和哄会赌票等诱骗手段，先得小惠，终受其大害，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尤以农村人为多。

（3）日寇收缴民枪、操纵盗匪。日寇于占领冀东以后，就设法先收缴民间枪支，以防民间反抗，继则放纵盗匪，使地方陷于紊乱，日寇又从中操纵，难于剿抚。后由日伪收编为地方保卫团，如通县城东之龙旺庄的胡坤，城南于家务的王宝珠（约带二、三百人），城西南马驹桥的魏三（魏瞎子），有枪百余支，就成了官匪，各霸一方，劫掠民财，为害至剧。甚至镇压抗日活动。日寇之“以毒攻毒”、“以华制华”的用心极为险恶。

供稿人：

徐　白　朱翊周　马汝良　梁耀庭

李嘉祐　冯学思　叶春普　柴济川

附记：稿中所述事实均为供稿人在通县一带所分别亲身经历。本文是综述稿，朱向如整理。

忆谭志诚烈士

赵　清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4年，我们通县永乐店地区来了冀东十四军分区二区队，在政委谭志诚、队长李满盈的指挥下，消灭了当地驻应寺警备队的一个中队；在马头通往永乐店镇路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接着又在东寺庄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端了鬼子的炮楼。这一连串的胜利，使八路军声威大振，在方圆几十里，打开了全民抗日的局面。广大群众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热血青年纷纷参加八路军。我也在八月份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那年我只有19岁。从此以后，我有幸在谭政委的教导、指挥下与日寇、敌伪作殊死搏斗，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不断地磨炼成长。

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战争年代的情景，谭政委英勇无畏、沉着、机智，言传身教，亲临战场为民族解放视死如归的崇高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深深地怀念。

记得在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是由谭政委亲自指导的。那是1944年9月的一天，当时谭政委带领我们二区队一连和通香武游击大队的部分同志，在永乐店一带集中十天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我们驻扎在德仁务村中街西头，谭政委住在路北韩家大院。次日早晨八点钟左右，通信员急促跑来，通知我立刻去谭政委住处。我急步前往，通信员作了介绍，谭政委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又叫通讯员给我倒一杯水，接着就问我的年龄和能不能吃苦，还表扬了我在前十天抗日宣传工作中的良好表现。然后神情严肃地说："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干过坏事，决心改邪归正的人。经过我们地下工作，争取了一支土匪队伍，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这里写了一封紧急联络信，决定由你带路和于班长一起，把信送到他们手中。"并一再叮嘱："这一路都是敌人占领区，从德仁务到采育镇三十六华里，其间困难危险一定不少，要沉着、勇敢。于班长虽是老侦察员，但人生地疏，你是当地人，要协助于班长圆满完成这次任务。"按照谭政委的要求，我们化装成日本一四一八特务，藏好密件，由保公所借两辆自行车，头顶春秋帽，眼戴黑墨镜，身着毛蓝士林大褂，脚踏鹿皮底礼服呢鞋。上路以后，走到西辛店，迎面来了二十多个手持长短枪的敌伪联武队人员。顿时，我心慌意乱，回过头去看看于班长，他却从从容容，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指手划脚，唧哩咕噜说了一大阵日本话，那群敌伪军立刻点头哈腰。不但未阻挠，还给我们指点往前走的道路。此时，我们飞快地骑过了凉水河大桥，到了日本人亲自把守的封锁线。鬼子盯的很严，看来，再象糊弄伪军那样就不灵了。我们干着急过不去，于班长决定硬闯。

夜幕降临后，我们用手榴弹炸开封锁线的一个缺口飞驰而过，我在前面跑，于班长紧跟在后边，手持二把盒子，一边点射着追来的鬼子，一边箭头似的向前猛冲。

又走了十八里路，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我们又遇上了几个身穿黄军装的伪军，我们仍以日本一四一八特务的身份混了过去。很快，我们打听到了接线人——采育镇的一个"伪保长"，转交了密信，传达了谭政委的叮嘱，这才如释重负，胜利返程。由于这次任务的完成，我军不但顺利收编了一支土匪队伍，还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谭政委多次表扬了于班长我们两个人。

谭政委是一位善于掌握敌情、捕捉战机的指挥员，每次带领我们作战都力求对敌情了如指掌。一次，他得到准确情报，日本鬼子的军火汽车要从附近经过。1944年10月中旬，谭政委率队隐蔽在京津公路东寺庄附近。我们立即封锁了公路，小日本企图下车夺路，被我迎头痛击。此役共毙敌七人，俘虏五人，还活捉了一名日军小队长，并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还有一次，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谭政委做了周密部署，带领通香武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昼夜端了西辛店伪大乡的老窝，在天亮前摧毁了驻应寺的伪警察所，并且顺势烧掉了一个敌伪炮楼，在我军无一伤亡的情况下缴获了大批枪支子弹。

我们取得的一次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农民们出钱、出物、出人，用各种形式支援抗日。仅仇庄一个村就通过宣传抗日，动员出三八枪、二环枪等七八支，子弹若干发，还有棉衣、棉鞋等不计其数，游击队又壮大一百三十多人，军民的抗日热情不断地高涨。

我清晰地记得，平时温文尔雅的谭政委，打起仗来却象只猛虎，英勇无畏，一马当先。1944年入冬期间，日本鬼子和伪军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谭政委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机，有力地打击敌人。经过侦察，游击队决定利用马头镇敌警备大队因刮大风而放松戒备的机会，消灭这股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敌人。战斗由谭政委负责指挥。晚饭后，谭政委亲自查看了战斗准备情况后，冒着寒风，率领二队一连和通香武游击队深夜奔袭马头镇，由一连率先投入战斗。霎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大作，仅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除一部分顽抗之敌很快被击毙外，又俘虏六七十名敌人。

然而，正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4年12月中旬，谭政委到军分区去开会，临行前大家劝他多带些人去，他考虑到多带人会削弱通州地区的抗日力量。于是，只带一个排的人整装出发了。12月28日，他们在平谷县大关撞上了敌人并被敌人包围，谭政委率领战友们几次突围都未能成功，在与敌鏖战几个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了。噩耗传来，通香武地区的广大军民悲痛欲绝。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无畏的好政委，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赤胆忠诚的好儿子！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永远缅怀着这位为民族独立而生，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先烈，我的好政委、我的革命指路人——谭志诚烈士。

赵　清　通县规划局离休干部



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篆刻　周良

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学运

耿宝珍

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抗战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之后，东北三省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三千余万同胞尽数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虎口。京奉线上，火车载来了成批逃难的东北民众；关内平、津城内到处飘荡着流亡学生的悲凉歌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日救亡高潮掀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涌向街头，开展集会、游行、请愿、宣传活动。潞河中学又停课了，他们再一次下乡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罪行。长期出刊的《协和湖》出版了“九·一八号”，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阐述了爱国青年的责任。

通县人民组织了“通县各界救国会”，潞河中学派学生代表高秉进(高沂)等参加。此救国会领导了通县人民的抗日斗争，进行宣传活动。11月中旬，通县中等学校，在潞河中学礼堂举行了“抗日演讲比赛会”，有的题目是“东北三省为什么沦陷了？”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痛斥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有的题目是“今天我们青年学生的责任”，阐述了读书和爱国的关系，讲明了救国救民的道理。演讲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听讲人抑着自己的感情，随着演讲人的感情和声调而起伏不平。

此时，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潞河中学和通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北平市委、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潞河中学先后建立了中共通州支部、通州区委、共青团支部、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领导了学校及通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上级不断派人来讲解国内外形势并布置工作。

1931年，在中共潞河中学支部书记姚廷枢(现名姚艮)及党员张文烈、刘玉林等的领导下，建立了“春草读书会”，宣传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32年2月下旬，潞河中学和通县各校学生在北平民众救国会的号召下，组织清查队、锄奸团、铁血团等，抵制日货，查封日货，锄掉汉奸。使通县抵制日货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抵制了日货的走私，狠杀了奸商走私的歪风。

2月25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

潞河中学校门(1936年)

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提出在红五月运动中要组织罢工运动，开展抵制日货、没收日货的斗争。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潞河中学的共青团员李文修（支部书记）、吕宜琛、高玉国、孙辑等，在校内贴标语，散发了许多抗日反蒋传单。他们还在夜深人静时，在校内外多次书写标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的屈辱卖国，在校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月，在河北省委领导下，共青团支部书记高玉国（张天明，此时李文修调走）和共青团员王承绪（王树生）、金家麟等建立了革命互济会，进一步领导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和义演募捐，他们还建立了“叮叮话剧社”，由共青团员刘继昌领导，请教师畸书　先生为指导。曾演出了一些进步的剧目，如北平剧联编的活报剧《乱钟》、田汉的话剧《第五病室》和曹禺的新编剧目《雷雨》等，演出非常成功。不仅在通县演出，而且到北平演出，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11月6日，通县各机关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教育馆举行农产品评议会，除请各机关负责人讲演外，还由潞河中学等单位表演“爱国心”话剧，宣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思想。

长城抗战爆发后，北平各校、各界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工作，援助前线将士。北平潞河中学的校友们积极行动起来，校友全绍武、黄振英等参加了“热辽吉黑后援会”，他们不断带领爱国志士到前线慰问。3月7日，他们还带领潞河中学学生高玉国（张天明）、陈率真、历史教师曹诗成等十几人到前线慰问。他们带着慰问品乘汽车来到二十九军前线指挥部遵化。由于路途遥远，山路难行，当汽车不能行走时，学生们就下车修路。他们在前线目睹了战士们血染的战场，观看了二十九军爱国将士们的英姿，受到了宋哲元军长的热情接见。宋军长不仅感谢同学们的慰问和支持，而且表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号召同学们要团结抗战。回到潞河后，由教师曹诗成在礼堂向全体师生汇报，进一步鼓舞了全校的抗日热情。全校很快掀起了支援长城抗战的热潮，他们为抗日将士义演、募捐，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送上前线。

不久，跟着形势的变化，前敌指挥部改在通县，通县成了大后方。前线伤员日多，潞河医院难以收容。很快把潞河中学礼堂改为“临时医院”，其西侧大房间为手术室，礼堂内很快布置了整洁的病床。医生是北京协和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百余名学生争做“看护员”，在周武赏同学的热情调度下，轮流值班，他们星夜抬伤员，给抗日流血负伤的英雄们打水、喂饭，帮助伤病员翻身、盖被，总是情绪高涨，忙个不停。伤员们的英雄气概感动了学生们，他们将年刊费千余元捐献给负伤的将士们。以高玉国为代表的共青团员组织了抗日救国十人团，发起了一个慰问伤病员的活动，给伤病员送了内衣，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温暖了每个抗日负伤战士的心。至战争将停时，才将伤员转移到了南方。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军队被迫撤退。日军更加疯狂进攻，4月18日日军飞机骚扰唐山、通州。5月12日通州被日军占领，5月20日大队日机在北平上空示威，22日通州郊外激战，城内失火。学校宣布停课，学生们纷纷回家。真是“华北地区连一个平稳的书桌也放不下了”。

国破家亡的灾难激起了潞河学生们的民族恨和爱国心。10月，共青团员王承绪、高玉国又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支部，高玉国任支部书记，继续领导潞河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了《反帝小报》，宣传抗日救亡的消息。当时，学生们主动要求军训，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从1934年春开始，全校高初中分为两个大队，高中大队推学生范新民为大队长，请校友李逢海（冯玉祥之妻弟）为教官，他是日本仕官学校毕业，治军严整。初中大队以王汝辑教官为领导。划望湖、桂菊、兰石宿舍为三个军训区，每日早升旗，晚点名，学

生们精神振奋。他们进行了艰苦锻炼，如用手凿冰洗脸，赤脚雪地跑步；险爬城墙，即以手扒足登城墙砖的边沿，比赛由平地爬到城墙的速度；长途行军，有一天一大队学员自通县跑步（有时缓跑）到北平西什库四中操场，与汇文中学做足球友谊赛。这些都是军事训练中增强体质的重要内容。

3月8日，河北省训练总监柳建夫由津来通，检阅各学生军并讲话一小时，讲了国家危亡的形势和军训的意义，肯定了学生们艰苦训练的精神，鼓舞了士气。

1935年4月14日，根据河北省的命令，高中学生到保定开始军事集训，河北省三十三所学校高中学生两千余人，在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领导下开始了军训生活。军训是严格而艰苦的。学生们怀着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克服重重困难，表现了高昂的情绪。他们穿军服，戴军帽，按班、排、连军事编制编队，住集体营房。

训练的内容有：基本步伐和操练、行军、战斗教练、实弹射击等。在行军中高唱战歌："拿起你的枪，快快儿赴前方……""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这些爱国青年们是国家的栋梁和希望。

首长们不断给学生们训话。6月5日，训练主任黄杰师长报告集训意义时，曾鼓励学生说："范仲淹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乐而不忘忧，且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吾应从之；但非商女之歌后庭也。有此意义，虽上前线，至赴义之时亦能自乐自如。"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

此时，河北省的形势一天天不安起来，大批日本侵略军入关，威胁着平、津，日本的飞机不断地在华北上空飞行。6月7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又签定了屈辱的"何梅协定"。

6月14日，训练主任黄杰师长向大家辞别讲话，他说话的语调一句比一句紧张而痛切，当说到"我们想不到短短三个月的军训，

军训中的潞河中学学生

也不能圆满结束，……我们对不起你们……"此时已语不成声，学生们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接着黄师长说："现在你们已不能挺胸脯说'我是中国人'，你们已失去了国家的保障……即使中国亡了，只要我黄杰有一口气，我就要抵抗日本侵略者……"军训在悲愤中结束了，学生们带着激情、悲痛和沮丧的心情返回了母校。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对外屈辱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不仅使军训受到夭折，而且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受到破坏。1934年春，学生运动的带头人高玉国（张天明）、张志德、陈魁勋、陈率真、金家麟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判刑后被押往南京东门中央陆军监狱。

语文教师王鸿堂（共产党员）组织进步学生到他家开会，曾教授学生一首歌曲，大意是："走啊！向前立定，曙光在前。同志们奋

斗，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由于坏人的告密，引起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的注意，屡次来学校查问，扬言准备逮捕。后来（约在1936年），王霭堂全家被迫离开学校。

此后，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

七·七事变前后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

“何梅协定”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策划吞并华北的“华北自治运动”。汉奸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于1935年11月25日在通州文庙粉墨登场，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随即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通州完全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一时乌烟瘴气。潞河中学的学生们不忍看那满城刺目惊心的变了式样的旗帜和标语，不忍看那令人哭笑的景象，决心不再进通州城。通州男、女师范迁移北平，并举行了抗议集会。

处此危难的情况下，陈昌祐校长镇定应付。在潞河中学的上空仍飘扬着中国的国旗。在大操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露天歌咏会，齐声高唱：“惟我中华”等歌曲，声震通州城。陈校长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与同学们一起引吭高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12月9日，北平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卖国”、“反自治”的大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潞河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响应，突然接到河北省教育厅的命令：“刻日放假，当即离校”。通州镇各学校立即遵命放假。这场即将掀起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变相镇压了。

1936年11月3日，伪匪李守信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犯绥北（今内蒙古自治区），傅作义将军奋起抵抗。全国各界积极援助绥远将士，捐薪、减食筹备慰劳。潞河中学学生们节衣缩食支援前方将士。

那时，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还驻防在潞河中学附近。过新年时，学生们与驻军联欢，并联合富育女中（今二中）献锦旗一面、猪两口，慰劳那些守卫祖国领土的将士们。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的通州城已完全处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之下，新城南门由日本宪兵队站岗，所有出入城门的人必须向日本宪兵恭恭敬敬地行鞠躬礼，经过搜身检查才能放行。家住通州城里的潞河学生为了免受屈辱，便绕道小南门，求个自由地出入。这时，只有在潞园内才能挺着腰杆过着自由人的生活。

在校的学生们一面读书，一面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决不当亡国奴，抗日救国”的思想，仍在学生中不时地交谈着。当时，中共在潞河设有地下支部，学生姜士栋（蓟县人）任支部书记，他向同学们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群众树立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信心。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在散发传单，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学校，有的同学慌了，只见他从容不迫，挺身而出，鼓励大家要镇定，并迅速藏好传单，巧妙地骗走了敌人。

战乱的年代，交通断绝，平、津、通州完全陷入日伪统治之下，许多外地同学难以返校，也不愿返校。有不少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大后方的抗日部队，或国民党的陆航军校。如衣复恩、乌钺（两人现在台湾）、黄松三（已牺牲）投考了空军，参加了抗日战争。东北学生吕宜琛（共青团员）回东北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者多人。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已深入敌后，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许多潞河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敌后抗日斗争，如姜士栋于1939年12月回盘山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斗争。王宝瑞（共产党员）于1941年回家乡平谷县马坊镇参加了抗日工作。许多潞河中学的校友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5年6月13日修改稿）

耿宝珍　潞河中学离休教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